《水浒传》与元末红巾军

张　同　胜

(兰州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　要:《水浒传》文本叙述中颇多关于“红头子”、“红巾”、“红衣”等的描述和叙事,这些细节表明《水浒传》与红巾军有着内在的关联。而《太守江公蠲免两卫屯粮碑记》则证明了“红头军”就是元末之红巾军,亦即小说叙事中的“红头子”。通过对红巾军起义历史的梳理,可知《水浒传》所反映的是元末红巾军。元末起义军以红巾为其标志的缘由主要有二:一、红色是汉人民族身份的象征,二、领导和组织起义的白莲教使然。

关键词:《水浒传》;红头子;元末红巾军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785(2014)05－0009－05

《水浒传》容与堂本[1]赫然印着小说乃施耐庵、罗贯中“集撰”成书,而小说所集来源据学者的考证或宋元话本或洞庭湖锺相、杨幺起义或方腊起义等,但对于元末红巾军这一来源或原型却似有所忽视,因而本文依据小说文本中的相关描述和叙事试论述之。

一、小说中的“红头子”即红巾军

(一)《水浒传》文本中“红头子”的相关叙述

1.史进看时,见陈达头戴乾红凹面巾,身披里金生铁甲;上穿一领红衲袄,脚穿一对吊墩靴;腰系七尺攒线搭;坐骑一匹高头白马;手中横着丈八点钢矛。(第二回)[1]29

2.(刘太公)看马上那个大王:头戴撮尖乾红凹面巾,鬓傍边插一枝罗帛像生花,上穿一领围虎体挽金绣绿罗袍,腰系一条称狼身销金包肚红褡膊,着一双对掩云跟牛皮靴,骑一匹高头卷毛大白马。(第五回)[1]75

大头领看时,只见二头领红巾也没了,身上绿袍扯得粉碎,下得马,倒在厅前……(第四回)[1]77

3.看那船时,每只船上只有五个人,四个人摇着双橹,船头上立着一个人,头带绛红巾,都一样身穿红罗绣袄,手里各拿着留客住,三只船上人都一般打扮。於内有人认得的,便对黄安说道:“这三只船上三个人,一个是阮小二,一个是阮小五,一个是阮小七。”(第二十回)[1]274

4.黄信道:“这个不必问了。连夜合个囚车,把这厮盛在里面。”头上抹了红绢,插一个纸旗,上写着“清风山贼首郓城虎张三”。……无移时,一辆囚车,一个纸旗儿,一条红抹额,从外面推将入来。花荣看了,见是宋江陷着,目睁口呆,面面厮觑,做声不得。(第三十三回)[1]477-479

5.只见林子西边,齐齐的分过三五百个小喽罗来,一个个身长力壮,都是面恶眼凶,头裹红巾,身穿衲袄,腰悬利剑,手执长枪,早把一行人围住[1]483。

秦明大怒道:“红头子敢如此无礼!不须公祖忧心,不才便起军马,不拿了这贼,誓不再见公祖!”[1]486

(秦明)只见军汉来报道:“东山边锣响,一队红旗军出来。”……只见探事的又来报道:“西边山上锣又响,红旗军又出来了。”[1]489

知府喝道:“我如何不认得你这厮的马匹、衣甲、军器、头盔?城上众人明明地见你指拨红头子杀人放火,你如何赖得过!……”[1]492

宋江开话道:“总管休怪。昨日因留总管在山,坚意不肯,却是宋江定出这条计来,叫小卒似总管模样的,却穿了足下的衣甲、头盔,骑着那马,横着狼牙棒,直奔青州城下,点拨红头子杀人。……”(第三十四回)[1]493

6.李逵看那人时,戴一顶红绢抓角儿头巾,穿一领

收稿日期:2013-10-23

基金项目: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编号:13LZUJBWZY016)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张同胜(1973－),男,山东昌乐人,文学博士,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

粗布衲袄，手里拿着两把板斧，把黑墨搽在脸上。（四十三回）[1]627

7. 病尉迟孙立是交角铁幞头，大红罗抹额，百花点翠皂罗袍，乌油戗金甲，骑一匹乌骓马，使一条竹节虎眼鞭，赛过尉迟恭。这呼延灼却是冲天角铁幞头，销金黄罗抹额……（第五十五回）[1]819

8. 李逵、樊瑞、项充和李衮率领的五百步兵，“那军都是铁掩心甲，绛红罗头巾……”（第七十七回）[1]1133

（二）简要的分析

上文所引《水浒传》中慕容知府责备秦明指拨“红头子”杀人放火，这里的“红头子”，指的就是元末的红巾军。何以言之？

清初九江人文德翼所撰《太守江公蠲免两卫屯粮碑记》曰：“九江之有三卫屯也，自洪武昉也。是郡，元季为徐寿辉、陈友谅所据，以为都会，杀其民殆尽，号以红巾土人，至今称红头军，一郡止留七户耳。明高皇既灭之，以其地旷故，使战胜之军落屯以居。江南卫曰九江，江西卫曰南昌，湖广卫曰蕲州，各以指挥使、千户、百户等职官辖之，厥屯皆错在九江。历建文至永乐，乃招民以来，军为主而民为客，屯则良而田则楛，势也。”[2]1821 其中的句读似有误，暂不论；从中可知，元季红巾军又被称作红头军，就是《水浒传》中所谓的“红头子”。

土人何以将红巾军称之为“红头军”？主要的原因是起义军以红巾缠头，即小说所叙述的水浒好汉们头戴“绛红巾”、“绛红罗头巾”、或“大红罗抹额”、“头上抹了红绢”等。但似乎又不尽然，其中亦有穿“红袄”、“红袍”或“绛绡衣”以明身份的。这是有史实依据的，元末的红巾军不惟头戴红巾，而且还身穿红衣、红袄，手打红旗。当然，红巾军最为关键的身份标志就是其“红头巾”。

而作为红巾军身份的“红头巾”在小说行文中有时未必直书，如“头巾歪整，浑如三月桃花”[1]28，或直接表明“头巾都戴茜根红，衲袄尽披枫叶赤”[1]75，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向读者言说着元末历史的影子，有意无意地透露出了《水浒传》是假借宋江故事来表达元末红巾军之时事。

《水浒传》所叙述的与红巾军密切相关的故事，如抢民女、劫财、杀人放火等，一方面应该说是写实，元末红巾军以数十万计，军队纪律固然严禁奸淫妇女、烧杀掳掠，但事实上难免出现小说所叙述的丑事或恶事；另一方面则体现了作者对红巾军的看法：他非常不赞成红巾军队伍中出现的那一类恶习。

二、《水浒传》反映的主要是元末的红巾军

在中国历史上，红巾军起义出现了多次：一是南宋初年北方抗金义军，他们以红布为标志而得名；二是元末江淮、蕲黄等地区的民众利用白莲教起义，起义军以红巾包头和红旗为号；三是 1854 年夏天，在广东爆发了何六、陈开、李文茂等领导的一场大起义，起义者头裹红巾，史称红巾军等等。

（一）三国时期的“绛帕头”

《三国志》卷四六《吴书一》下注《江表传》云：“时有道士琅琊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诸将复联名通白事陈乞之，（孙）策曰：‘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尝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3]1110

上引小注后被《三国演义》所吸纳，并在孙策斩杀于吉的故事中基本予以全部引用。小说写道，孙策对众人说：“……昔交州刺史张津，听信邪教，鼓瑟焚香，常以红帕裹头，自称可助出军之威，后竟为敌军所杀。……”[4]314 张津信奉的是道教之“太平青领道”，他“常以红帕裹头”，而不是如太平道那样以黄巾裹头。

众所周知，爆发于元末的红巾军起义，其背后的宗教组织是白莲教。白莲教是民间宗教，其教义颇为杂糅，包含了白莲宗、摩尼教、明教、弥勒教、道教等诸多思想。由此似可叩问：作为中国佛教之一的白莲教教徒以红巾缠头，是取自于道教吗？

（二）宋代红巾军

《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纪四》宣和三年载：“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5]407 从宋江淮南盗的本事来看，它与红巾军没有丝毫的联系。

但由于《水浒传》是集撰自南宋宋江淮南盗传说至元末割据群雄的争斗故事，因此其中的“红头子”叙事不排除或许也有南宋初年红巾军传说的遗留。南宋初年北方抗金义军，亦当时朝廷所谓“忠义军”或“忠义人”之一部分，因其以红巾为标志而得名。后来红巾军发展到河北、淮北地区。《续资治通鉴·宋高宗建炎元年》：“先是河东之民，所在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号。又有红巾军，於泽、潞间尝劫宗翰寨，故金捕红巾甚急，然真红巾不可得，多杀平民亡命者。”[6]248

到了南宋末年，“红巾”却又成了“贼”的标志。宋人周密所撰《齐东野语》卷十三“优语”条记载：“近者己亥岁，史□之为京尹，其弟以参政督兵于淮。一日内宴，伶人衣金紫，而幞头忽脱，乃红巾也。或惊问曰：‘贼裹红巾，何为官亦如此？’傍一人答云：‘如今做官底，都是如此。’于是褫其衣冠，则有万回佛在怀中坠地。其旁者云：‘他虽做贼，且看他哥哥面。’”[7]140 这段记载很有史料的价值，从中可知在朝廷看来是所谓

“贼”头裹红巾,优伶怀揣“万回佛”、头戴红巾,从而表明“红巾”与民间佛教是有着密切关联的。这表明在南宋末年的时候,民间佛教影响下的红巾军或佛教教徒极为普遍,甚至在官员、优伶等中都有其信徒,而其身份的标志则是“红巾”。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水浒传》中所叙述的“红头子”究竟是南宋初红巾军的遗留还是元末红巾军起义的反映呢?我们知道,罗晔《醉翁谈录》所载的话本名目有《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等。小说第九十四回中“这回话都是散沙一般,先人书会留传,一个个都要说到”便表明《水浒传》历经代代说话人或书会老郎的演说和打磨。

我们判断《水浒传》中的“红头子”是元末红巾军还是南宋初红巾军的一个重要的角度就是看看《大宋宣和遗事》文本的叙述中是否已经具有了红巾军的叙事,这是因为在《水浒传》成书过程中,《大宋宣和遗事》是其中的重要的一环。既然《大宋宣和遗事》中没有“红头子”的任何描述和叙事,我们就可以断定《水浒传》中“红头子”的叙事所反映的不是宋代的八字军,而是元末的红巾军。

(三)元末红巾军

元末明初的叶子奇在其《草木子·杂俎篇》中云:“初,元世祖命刘太保筑元京城。及开基得一巨穴,内有红头虫,不知其几万。世祖以(之)问刘曰:‘此何祥也?’刘曰:‘异日亡天下者,乃此物也。’”[8]83 谶纬学是中国古人解释世界的一种重要的角度和方法。这里的“红头虫”即俗谓“红头子”,喻指元末暴动的红巾军。

元末的红巾军,是元末反抗朝廷的主要力量。起义最初是与明教、弥勒教、白莲教等民间宗教结合所发动的,因手打红旗、头扎红巾,故称作“红巾”或“红军”。民间宗教在其传播过程中,一般都有其标志或暗号。“元末弥勒教起义时以头裹红巾为标志,故又称红巾军;白莲教也维持了它参与元末弥勒教起义的一贯标志,头裹红巾。”[9] 红巾军又因焚香聚众,被称作“香军。”香军,《庚申外史》云“盖以烧香礼弥勒佛得此名也”[10]5。

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初,韩山童与刘福通等召集三千多名教徒,在河北永年白鹿庄聚义。韩山童宣传“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准备利用白莲教起义。但不幸消息走漏,韩山童被官军杀害,刘福通携韩山童之子韩林儿逃走。后韩林儿“僭称皇帝,又号小明王,建国曰宋(史称韩宋),建元龙凤”,响应者风起云涌,“时皆谓之红军”,因起义者即教徒,“亦称‘香军’”[11]3682。至正十七年(1357),韩宋政权分兵三路进行北伐,其口号是“虎贲三千,直捣幽燕;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刘福通所领导的红巾军主要在北方活动,史称北方红巾军。徐寿辉、彭莹玉等领导的白莲教教徒在蕲、黄地区起义,布王三、孟海马等领导的红巾军在湘、汉起义,他们被称之为南方红巾军。

蒙元朝廷派遣大兵围剿红巾军。叶子奇《草木子》卷四《谈薮篇》云,宰相脱脱被解兵权后,其百万大兵作鸟兽散,“大率皆归红巾”[8]56。这样一来,大江南北,到处都是赤帜。

朱元璋投靠的郭子兴部,也属于红巾军:“文移用宋龙凤年号,旗帜战衣皆红色”[12]9。朱元璋曾说过元末“民人尽乱,巾衣皆绛,赤帜蔽野”,“望之两山皆赤”[13]。《元史·五行志》记载了当时的一首歌谣,辞云:“塔儿白,北人是主南是客;塔儿红,朱衣人做主人公。”这里的“红衣人”显然指的是红巾军。《醉太平》的一阕云:“堂堂大元,姦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罚重,黎民怒,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浪贤愚,哀哉可怜。”[14]4389-4390 其它诸如“遍野皆赤”(《续通鉴》至正十七年条)、“满城都是火”(《南村辍耕录》中语)等记叙都表明了红巾军如火如荼的浩大势力,以及这一势力得以昭显的身份标志便是红巾或红衣!

(四)红巾军火种不熄

徐鸿儒起义、天地会、太平天国、红枪会等都继承了红巾军的革命传统。白莲教、明教等在明代虽然被严禁,但它们作为民间秘密宗教一直在社会底层活动着。一旦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达到了不可忍耐的程度,它们就组织民众起来造反,如同火山一样喷发。

从清末响应天平天国革命的红巾军起义来看,红巾军即使是到了清末,其火种也仍然没有熄灭。何六是广东天地会四大堂口之一洪义堂的头领,是红巾军东路大元帅。何六起义是广东红巾军响应太平天国运动的先锋,不久其它堂口首领也率众起义,各路红巾军互相支援,声势浩大[15]。在 1856 至 1857 年间,鄂西北也爆发了红巾军起义,他们“头裹红巾,北起南阳,南到宜昌,东抵枣阳,西达竹溪”[16],攻克了十多座城镇,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

三、为何以红巾为标志

《礼记》记载:“周人尚赤。”《吕氏春秋·应同》云:“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率则火。”[17]83 其后,汉、宋、明等王朝都是“火德”,尚赤。王国维《古胡服考》云:“汉光武帝常着绛赤帻。”[18] 依据古代的比德思想可知,红色象征着义勇。按照民间的看法,红色还可以辟邪,如湖南一带汉族民俗说,钟馗打鬼时身穿着红袍,头戴红冠,绘以红脸、红髯,还打着一把红色的

伞。

民间秘密宗教的勾当,除非是龙华会上人,否则难以做出清晰而肯綮的解释。但是从汉末黄巾起义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而信徒义军皆头戴黄巾来看,红巾起义似乎也是“炎天当立”的意识使之头戴红巾。

从蒙元时期的人文地理来看,汉民族之南人主要生活在南方;按照汉文化五行思想,南方是火,是朱雀,是红色;汉人自称“炎黄子孙”始自清末民初,而南方人一般自称是炎帝的后裔;“大约东汉(25－220)以后才开始出现‘汉人’这一名称,是自称,也是他称”[19]1,汉人是依据汉王朝之汉而命名的;史传中的刘邦斩白蛇而起义,其实是以白蛇喻指西方起家的秦王朝(西方属金,白色)。从这种思想意识出发,似可推知红巾军起义头戴红巾的文化意蕴。

另外,从《大宋宣和遗事》的行文也可以证明上述汉人的民族意识和解释意图。《大宋宣和遗事》云:“徽宗与林灵素前行时,见一树清阴密合,见二人于清光之下,对坐弈棋:一人穿红,一人穿皂,分南北相向而坐。二人道:‘今奉天帝敕,交咱两个弈棋,若胜者得其天下。’不多时,见一人喜悦,一人烦恼。喜者穿皂之人,笑吟吟投北而去;烦恼之人穿红,闷恹恹往南行。二人既去,又见金甲绛袍神人来取那棋子棋盘。徽宗使林灵素问:‘早来那两个弈棋是甚人?’神人言曰:‘那着红者,乃南方火德真君霹雳大仙赵太祖也;穿皂者,户北方水德真君大金太祖元皇帝也。’言罢,神人已去。”[20]9 且不说历史上的赵匡胤陈桥兵变称帝后留下来的帝王像就是一个穿着红袍而不是黄袍的形象,就以《大宋宣和遗事》的叙述来看,赵匡胤与完颜阿骨打的区别主要就在于其服色,一为红颜色,一为黑颜色。而这两种颜色与五行思想中的方位完全契合,红为南方之宋,而黑即北方之金。在《水浒传》中,赵太祖之为霹雳大仙的叙述被继承了下来,而五行思想的体现之一“红”色也具有了象征的意义。既然刘福通、韩林儿等复宋反元,那么“红”色从而又具有了民族、政治和宗教等文化意义。红巾军之所以头戴“红巾”而不是其它颜色,或许与这有关系罢?

除了以上从民族文化视角进行观照外,还有一个宗教视角的解释。据宋人方勺《泊宅编》的记载,宣和二年十月,方腊率众起义,“自号圣公,改元永乐,置偏裨将,以巾饰为别,自红巾而上凡六等……”[21]109 从中可知,红巾曾被摩尼教教徒用以作内部分层的标志之一。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认为摩尼教的信徒本来崇尚白色,而方腊等起义时却以红巾或赭服为标志,这表明了摩尼教“接受了弥勒佛衣红着赭的传说”[22]94-95。方庆瑛认为,元代初期,摩尼教遭禁,白莲教则可以公开活动,因此摩尼教教徒流入白莲教是可能的[23]。任宜敏认为,白莲教“它表面崇佛,实质上却是在低水平上撷取并东拼西凑地杂糅了弥勒教、摩尼教、道教末流乃至民间方术等内容的大杂烩”[24]。元末白莲教起义,其中也掺杂着香会或弥勒教教徒,或者说白莲教也吸纳了摩尼教、弥勒教、道教等的教义,从而以“红巾”、“红衣”、“红旗”为标志。

从以上论述可知,无论是汉还是宋,作为汉民族符号的象征,似乎都与“红”色有关;而元末白莲教教徒反抗“胡虏”的民族起义又利用了“红”色所代表的宗教文化意义,即“红”色象征着民族与信仰。这似乎是起义军头戴红巾的缘由吧。

四、馀论

小说文本叙事中的“红头子”即元末的红巾军,这一发现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与之相关的其它问题,如从红巾军可推知其背后的宗教组织白莲教,以及“水浒好汉本是天上的魔星,宋江是星主,从而一百零七个好汉忠心于星主宋江”[25]这一叙事的宗教文化意义等。

《元史》卷四十二“顺帝纪五”记载:“辛亥,颍州妖人刘福通为乱,以红巾为号,陷颍州。初,栾城人韩山童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广平永年县。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26]891《庚申外史》说到江西袁州和尚彭莹玉及其徒弟周子旺发动起义时说:“以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反。反者背心皆书佛字。以为有佛字,刀兵不能伤。人皆惑之,从者五千余人。”[10]3 元末蕲、黄地区红巾军的兴起得益于白莲教的宗教活动,而其中的教主之一就是彭莹玉和尚,他直接发展了“普”字号教徒,如邹普胜、丁普郎、李普胜、赵普胜、欧普祥(即欧祥,又称欧道人)、项普略、陈普文、杨普雄、况普天、李普成、王普敬等[27]。“从历史渊源上说,北宋王则倡言弥勒出世、反抗当朝;元末韩山童、郭子兴、陈友谅、朱元璋都鼓吹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二者具有先后承继的关系。”[28]如此等等,都表明《水浒传》与白莲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另撰文详细探讨。

《水浒传》叙事中的“红头子”即元末的“红巾军”,这一发见的意义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它对于我们进一步探析《水浒传》的成书方式、作者问题、宗教问题等都有着重要的启示和解蔽价值。

参考文献:

[1](明)施耐庵,罗贯中. 水浒传[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清)康熙九江府志[M]. 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

[3] (晋)陈寿. 三国志 [M]. 北京:中华书局,1971.
[4] (明)罗贯中. 三国演义 [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5] (元)脱脱,等. 宋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6] (清)毕沅. 续资治通鉴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 (宋)周密. 齐东野语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8] (明)叶子奇. 草木子 [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9] 孙逊,周君文. 古代小说中的民间宗教及其认识价值:以白莲教,八卦教为主要考察对象 [J]. 文学遗产,2005(5).
[10] (明)权衡. 庚申外史 [M]. 上海:涵芬楼,1920.
[11] (清)张廷玉,等. 明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 (清)谷应泰. 明史纪事本末 [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13] (明)朱元璋. 高皇帝御制文集:卷十四 [M].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03.
[14] (清)褚人获. 坚瓠首集 [G]//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十三编:第八册. 台北:台湾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85.
[15] 广东师院政史系学员红巾军调查组. 何六领导的红巾军与太平天国革命 [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76(1).
[16] 萧致治. 太平天国时期鄂西北红巾军起义 [J]. 武汉大学学报,1993(2).
[17] (秦)吕不韦,等. 吕氏春秋 [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18] 王国维. 古胡服考 [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19] 杜若甫,叶傅升. 中国的民族 [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20] 佚名. 大宋宣和遗事 [M]. 北京:北京中电电子出版社,2004.
[21] (宋)方勺. 泊宅编 [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22] 马西沙,韩秉方. 中国民间宗教史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3] 方庆瑛. 白莲教的源流及其和摩尼教的关系 [J]. 历史教学问题,1959(5).
[24] 任宜敏. 白莲宗的兴衰及其与白莲教的区别 [J]. 人文杂志,2005(2).
[25] 张同胜. 三国演义本主现象试论 [J].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3).
[26] (明)宋濂,等. 元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27] 雷喜梅. 普字号教徒与蕲黄红巾军宗教势力的兴衰 [J]. 武汉文史资料,2002(7).
[28] 许军. 平妖传二十回本是对元末宗教起义的历史反思:兼评四十回本相关改动的不足之处 [J]. 明清小说研究,2010(1).

On *Outlaws of the Marsh* and the Red-scarf Army of Late Yuan Dynasty

ZHANG Tong-sh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20,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a lot of descriptions and narrations concerning people with red hats, scarves and garments in *Outlaws of the Marsh*. These details show that the work is related to the red-scarf army. And *The Epigraph concerning the Exemption of Rice as Tax by Prefecture Chief Jiang* proves that the red-head army was the red-scarf army of the end of Yuan Dynasty, namely the red heads in the novel. Through the sorting of the rebellion of the red-scarf army, we can find that the novel has reflected some stories concerning the red-scarf army of the end of Yuan Dynasty. There are two reasons why the army took the red scarves as their symbols: the red color as the identity of Han people, and the distinction from the White-lotus religion.

Key words: *Outlaws of the Marsh*; red head; red-scarf army of the end of Yuan Dynasty

(责任编辑:王建平)